

# 被殖民者的創傷及其救贖

——台灣作家龍瑛宗後半生的歷程

呂正惠

---

**[提要]** 日據後期台灣著名小說家龍瑛宗，一向被認為作品中充滿了感傷、頹廢情緒，對殖民統治只見隱忍地接受，並未表現反抗精神。其實這並非龍瑛宗的真面目。本文以龍瑛宗後半生的寫作和經歷證明，龍瑛宗心理上一直有強烈的被殖民創傷，他始終心向祖國。他晚年堅持學習以中文創作，以及他八十歲以後的三次祖國之行，都是為了撫平創傷的自我救贖。

**[關鍵詞]** 龍瑛宗 台灣小說 被殖民 心理創傷 自我救贖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4) 01 - 0082 - 10

---

## 引言

龍瑛宗於1911年生於現在的新竹縣北埔鄉，本名劉榮宗，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1937年，他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懸賞佳作獎，一舉成名，並一躍而成為當時台灣的重要小說家之一。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龍瑛宗共發表了二十多篇小說。這些小說大多描寫一個失意落寞的知識分子，充滿了感傷頹廢的色彩。<sup>①</sup>

從小說的基本情調來看，容易讓人誤以為，龍瑛宗是一個游離於社會之外，不關心政治社會現實的作家。龍瑛宗又因為小說風格與當時在台灣在日本作家西川滿相近，受到西川滿激賞，成為西川滿集團的重要作家，因而被懷疑傾向日本人。其實，這都是因為沒有細讀龍瑛宗所有作品而產生的誤解。本文將以龍瑛宗後半生的歷程證明，龍瑛宗是一個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在日本統治下，他只能隱忍，在國民黨的戒嚴體制下，他有意封筆。解嚴後，他重新寫作，逐漸敞開長期受壓抑的內心懷抱，終於讓我們看清楚了他的完整面貌。

葉石濤曾回憶，他在1944年和龍瑛宗、吳濁流的一次談話，他說：

他們倆是客人，起初用客家話嘍哩咕嚕的說了一陣，後來看我這傻青年一句話也聽不懂也就特發慈悲改用日語。

那中午的一席話的確給我帶來了震驚：這多少和我餓著肚子有關，他們討論，日軍

在南洋打仗節節敗退的慘況到預測台灣將被解放後走向哪裡去的問題。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長達十多年的我，滿腦子都是日本人的神話，我相信日本是神國，絕不會有戰敗的一天的。……

“日本真的會戰敗嗎？”我用懷疑的口吻問道。

“必敗無疑！”兩位先輩作家異口同聲堅決的回答。

“戰敗後，我們台灣會變成哪一國人？”

“這還搞不清楚。這要看看（米）美國軍隊會不會占領台灣而定。”吳濁流先生沉吟了一會兒回答。

“馬關條約的結果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戰敗，中國戰勝，馬關條約會失效。台灣可能回到祖國的懷抱。”龍先生說。

“我們的祖先本來是漢人，來自一衣帶水的大陸。戰後變成中國人是順理成章的事吧！不過，對於中國人和中國是什麼一回事，我倒有些心得。我到過大陸。我正在寫一本小說《胡志明》，寫的正是中國人與台灣人互相認同的危機。”（按，此段為吳濁流所言）<sup>②</sup>

從這一段話可以清楚看到，龍瑛宗和吳濁流一樣，平日就非常注意時局，並努力客觀分析台灣的前途。反過來說，他的小說，是在日本殖民當局高壓統治下，對台灣知識分子無可奈何處境的一種曲折的反應。龍瑛宗正是以這種方式表達了他在戰爭時期的憂鬱心情。龍瑛宗不是一個反抗型的作家，但也不是一個頭腦不清楚、沒有定見的人。他這種寫作和處事的態度，也充分表現在光復後的生涯中。

本文即打算分析龍瑛宗後半生的活動歷程，藉以呈現他在艱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堅忍的生活下去，並不失其一貫的立場。龍瑛宗的這一特殊經歷，從現在來看，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值得我們思索。

---

從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將近一年的時間可以說是龍瑛宗一生最活躍的時期。我們可以從他在這一時期的活動和所寫作的文章，來揣測他在光復初期的心情、想法，以及橫互其中的複雜的轉折。

在1945年11～12月間，台灣剛光復不久，龍瑛宗連續發表了兩篇小說、兩篇雜論。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到龍瑛宗對“光復”的某些看法。在11月10日刊出的《民族主義的烽火》（《新青年》一卷三號）一文裡，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源頭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軍，孫文的革命運動繼承了這一精神，並傳到蔣介石手中。看起來，龍瑛宗是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看做是中國民族主義勝利的一環。

也就是從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他以兩篇小說來表達他對光復的喜悅。在第一篇小說《青天白日旗》（11月15日刊於《新風》創刊號）裡，農夫阿炳看到，

白色陽光之下，旗子以清紅色翻過來。定神一看，於左邊隅角青天裡象徵著白日而光芒四射。

阿炳於霎時間又想起了。

“呀！木順仔。那青天白日旗啦，咱們的新國旗呢。”

當阿炳和兒子木順揮舞著國旗向前進時，迎面來了一個日本警察。剎那間，阿炳想躲避，但，阿炳又想回來，現在，是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民麼？害怕什麼呢？阿炳牽著木順仔和旗子，拋棄了彆扭心理，毫不介意地挺胸昂首，搖搖擺擺走過去。警察呆著看他一眼，倒也讓他們走過去。

木順仔陡陡阿爸問了一聲說：

“阿爸，咱們從今以後不做日本人，而做支那人麼？”

“兒子呀！不要叫支那人，應該叫中國人，知道麼？咱們是中國人。”<sup>③</sup>

在這裡，終於擺脫了殖民地人屈辱的身份，勝利與光復所產生的民族的自豪感明顯可見。

第二篇小說《從汕頭來的男子》（12月20日刊於《新新》創刊號），龍瑛宗寫了一個熱情愛國而又魯莽率直的台灣青年周福山。他憤慨於日本對台灣的差別待遇，到大陸跟著叔父做生意。但又看到大陸的台灣商人藉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優勢，佔盡大陸的便宜。他知道只有武裝力量才能解救全中國。抗戰爆發，他被迫回到台灣，卻又整天擔心中國能不能打勝。可惜的是，他在光復前夕得急病而死。在小說結尾，敘述者想著：

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材，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的可敬的青年，太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恭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sup>④</sup>

結尾雖然有點哀傷，但全篇的重點還是在描繪周福山熱情、直率的愛國形象，以及對中國勝利的渴望。

也就是在這種昂揚的民族主義氣氛下，龍瑛宗寫了一篇短文《文學》（同樣刊於《新新》創刊號），對日據時期的文學做了深切的檢討，並表達了在新的時期再出發的決心：

回頭看看台灣的情況吧！台灣曾為殖民地；在世界史上，未曾有過作為殖民地而又文學發達的地方，殖民地與文學的因緣是很遠的；即便如此，台灣不是有過文學嗎？是的，曾經有過看似文學的文學，但，那並不是文學，知道了嗎？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如果有也只是戴著假面具的偽文學。總之，我們非自我否定不可，我們一定要走上光明正大的道路。<sup>⑤</sup>

文章中自我批判的味道相當濃厚，似乎要全部否定自己以前的一切創作。但反過來講，這也是一種全新的、樂觀的氣氛中重新再出發的決心，反而更能夠襯托出他當時的心境。

1946年初，龍瑛宗主編《中華》雜誌，這是一個文化性的刊物，只出兩期就停刊。不過，從創刊號（1月20日出刊）上的《卷頭語》已可看出這一份雜誌的方向：

首先要昂揚“中華”的意識。我人是中華民族、我們非以中華民族為榮不可、我們中華民族是歷史的主人。但這非消滅我們的封建性和落伍性、建設近代的民主主義國家則不成。……在此光復之際、要緊急研究祖國之文化、認識今日之立場、向新中華民族的再建前進。<sup>⑥</sup>

在這篇文章裡，積極樂觀的氣氛並未改變，但已經提出消滅封建性和落伍性，建立近代的民主主義國家的問題。看起來，龍瑛宗已經開始意識到，光復以後，台灣仍然需要面對許多問題。2月10日龍瑛宗在《新新》第二期上發表了雜文《兩人共乘的腳踏車》，文章一開頭就說：

最近有點憂鬱。因為憂鬱，為了消愁解悶，試著寫些荒唐無稽的小說。例如《楊

貴妃之戀》等。然而，憂鬱仍然固執地纏繞著我，於是決定去充滿光復景象的街上溜達。<sup>⑦</sup>

這樣的憂鬱心情，應該是和逐漸出現的光復亂像有關係的，可以和《卷頭語》上所提出的問題相呼應。

不過，龍瑛宗當時的心情好像沒有很大的改變，他還是以積極的態度去迎接他的下一個工作，他於3月間從台北來到台南。開始擔任《中華日報》文藝欄的主編。7月以後，文藝欄改為文化欄，不過，性質並沒有很大的改變，這可以說是一個從頭到尾兼顧文藝與文化的綜合欄目。

從整體編輯方針與龍瑛宗個人的作品來看，有幾個方面值得分析。首先，龍瑛宗在《個人主義的結束——老舍的〈駱駝祥子〉》一文中（3月15日刊出）寫道：

個人主義的悲劇是中國的悲劇。……在中國只有不自覺的自我的原始性衝動，那是個人主義與吝嗇。自我若能與社會結合，才會發生自我意識而覺醒。自我是與社會確實有密切的聯繫，自我的命運被包括在社會的大命運裡，而且自我意識昂揚到社會性的意識的時候，就能看到近代意識的發生。

然而，中國個人主義的產生，無疑就是中國的封建性社會所致，除此以外沒有可能。假若要克服個人主義，等於要克服封建社會。<sup>⑧</sup>

這裡的社會認識顯然要比《中華》雜誌《卷頭語》深刻得多。龍瑛宗把“原始底自我衝動”（即本文中的“個人主義”）和中國的封建社會繫在一起，而把覺醒的自我意識作為近代意識的基礎，這種自我意識又必須和巨大的社會變革緊密相連。龍瑛宗這種社會意識已和瀰漫於當時整個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社會認識相當接近了。我們可以在龍瑛宗稍後的一篇雜文《給一位女人的書信》更明顯地看出這一傾向：

但現今的情勢仍舊無法真正地發展出文化。它可是個大問題。台灣的命運受制於整個中國之政治。

現在的中國是落伍的文化。因此，台灣的文化也不得不受到落伍的文化牽制。但是，切斷中國落伍文化之枷鎖者，必須是中國人；而切斷台灣落伍文化者，也必須是台灣人。不能夠坐著等待所有的成果實現，它必需經過戰鬥才能獲得。<sup>⑨</sup>

龍瑛宗已經清楚看出，光復後的亂像和整個中國的問題無法分開，而台灣的命運當然也就包容在中國問題的命運之中。現在他知道，應該怎麼樣去面對台灣的未來。所以他把文藝欄改成文化欄，並特別設立了“知性的窗”，以便更廣泛的討論文化、社會現實問題。

龍瑛宗對台灣的情況憂心，也認識到全中國的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對自己國家的熱愛並沒有因此減少。從5月20日到9月11日之間，他分七十八回把章陸所寫的《錦繡河山》以中、日對照的方式刊載出來，就是一個證明。<sup>⑩</sup>

其次，從龍瑛宗自己在文藝欄所發表的文藝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本人心態的改變。他仍然寫了一些個人性的傷感的詩歌，如《海涅喲》（6月1日）：

海涅喲 // 在世界盡頭的小島 // 有一位想念你的 // 可憐的詩人

那位詩人 // 是無名的詩人 // 吃著稀飯的 // 不歌唱的詩人

海涅喲 // 在台灣的舊街鎮裡 // 有一位想念你的 // 可憐的詩人

那位詩人 // 是無名的詩人 // 在光復的陰翳下哭泣的 // 不歌唱的詩人<sup>⑪</sup>

在這首詩中，龍瑛宗表現了他在混亂時局中的無助與感傷。不過，他向海涅呼求，應該知道

海涅是個關心政治的人。他把自己的徬徨擺放在客觀現實之前，這和日據時代的作品企圖逃避現實還是有所不同的。另外兩首詩則更明顯表現出了往新的方向發展的可能：

來到古都台南，我不禁想起阿爾及利亞。雖然我不曾去過阿爾及利亞，但記憶中映著電影“映鄉”的情節。兇猛的太陽，亂舞的塵埃，燃燒的鳳凰木，鈴聲響著的牛車，累積歷史的古街。例如，這幅畫中所出現的高砂町。該條街的附近是昔日鄭成功時代台南唯一最熱鬧的街道。現在則瀰漫著孤寂的氣息，曾經三次遭到轟炸，結果變成諸位所看到的廢墟。街上眾人正為生活艱難而喘不過氣來。街上的小孩無法如昔日的小孩一樣無牽無掛地玩耍。他們是賣著甘薯的生活小鬥士。三月的季節風涼爽地拂過白色的廢墟和孩子們的身上。（《與生活搏鬥的小孩子》，3月21日）<sup>12</sup>

我 // 以異國的曲調 // 唱著歌

我是 // 真正的中國人 // 真正的中國人

我 // 在心裡哭泣 // 為了老百姓 // 為了老百姓（《心情告白》，10月17日）<sup>13</sup>

第一首是初到台南時所作。他對台南的環境還感到陌生，多少參雜了他學自西川滿的異國風味（如阿爾及利亞、印度洋的三月季風），不過，他表現出了想要融入人群的心情。在第二首詩中，龍瑛宗明確地表示，他雖然曾經用“異國的曲調唱著歌”，但他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為了老百姓而哭泣。把作家的責任和民族、人民連繫在一起，這樣的表白，在以前的龍瑛宗是不可想像的。

龍瑛宗受到台灣光復、民族復興的鼓舞，雖然對於時局逐漸感到失望，但由於回到祖國的懷抱，仍然有一份為自己國家而努力的責任感。為此，10月23日，就在日文欄即將廢刊的前兩天，他發表了《停止內戰吧》一詩，最後一節是：

停止內戰吧

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自由和繁榮之上建立

我們的美麗新中國<sup>14</sup>

在失望之中，他仍然對自己的國家有著迫切的期許。

10月25日，光復一週年，台灣所有雜誌和報紙的日文欄一律廢刊，還沒有學會中文的龍瑛宗無事可做，必須另找工作。時局更令人失望，山雨欲來，在這暗淡的日子裡，他發表了雜文《台北的表情》（《新新》二卷一期，1947年1月5日）：

那天晚上，我獨自在京町散步後，再由太平町走到大橋上，看看台北夜裡的表情，台北的夜裡，確有艷婉的美，但是我已經疲倦了。從前我時常抱著個希望來在這裡徘徊著，但是，現在的我是很多的回想比希望更加多倍在我的懷裡還生著，他更使我感著疲倦。<sup>15</sup>

就這樣，龍瑛宗告別了他在光復初期的向外活動，這可以說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站在時代的舞台之前的公開活動。

## 二

《中華日報》日文欄停刊後，龍瑛宗首先需面對謀職問題。他經《中華日報》社長盧冠群

的介紹，到台灣省長官公署（不久之後改組為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後改為處）任職，歷時一年多，其後因所負責的工作裁撤而被免職。1949年6月，他因友人的介紹，得以進入合作金庫。從此以後，一直在合庫任職，直到1976年8月退休。

從前一節所述，可以知道，龍瑛宗在1946年下半年，由於對時局認識的加深，已逐漸轉向民眾文學的道路。日文的廢用，使他不得不暫時離開文壇。而且，不久即發生“二·二八”事變。以他的謹慎、內斂的個性，他是不可能如呂赫若去參加地下黨的，也不可能如楊逵那樣繼續為台灣文學的前途奔走。此後，他即自甘沉默地、孜孜矻矻地在合庫工作。以他認真的態度，他從辦事員升為課長。而且，由於他不爭不奪的個性最後竟然被委派為人事課長。據說，合作金庫完整的人事制度，還是在他手中建立的。<sup>⑥</sup>

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學。據他次子劉知甫所述，龍瑛宗下班回家後即進書房看書。當長子文甫上大學時，他親自教文甫日文，並且教導他閱讀文學，包括阿部知二、橫光利一、小林多喜二（日本著名左翼小說家）、中日對照的《唐詩三百首》等。他曾想把劉文甫培養成文學評論家，又曾想讓劉知甫的二女兒就讀台大中文系。這一切都表明，他從未忘情於文學。<sup>⑦</sup>

據劉文甫所述，曾有國民黨方面的人士知道龍瑛宗在國外（按，當指日本）小有名氣，希望他寫一些文章。他不願意被利用，索性封筆。文甫又說，他父親在五〇年代對大陸政權極為嚮往，常偷聽對岸的廣播，到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才感到失望。<sup>⑧</sup>不過，他始終對國民黨政權極為不滿，每談到時，會氣得發抖。這一切可以說明，龍瑛宗雖未忘情於文學，但對台灣政局不滿，因此不願意寫作。<sup>⑨</sup>

七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發生大變化，要求民主化的呼聲愈來愈大，鄉土文學思潮興起，黨外政治運動不斷蓬勃發展。這種情況，當然為龍瑛宗所樂見。這時，日據時代的作家也逐漸有人談論，並重刊或翻譯他們的作品，其中以楊逵最受矚目。

龍瑛宗日據時代小說的中譯問世，比楊逵晚得多。1978年，張良澤所譯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一個女人的記錄》刊出，1979年遠景出版社出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七冊收入龍瑛宗7篇小說。這時，龍瑛宗作為日據時代重要小說家的成就，才能稍為讓戰後的台灣讀者認識到。1985年，蘭亭書店出版龍瑛宗的小說集《午前的懸崖》，收入11篇，與前書合計，去其重覆，共17篇。至此，舊日龍瑛宗的面目才略為完整的呈現出來。

當時，主要翻譯龍瑛宗舊作的是張良澤和鍾肇政，他們都和龍瑛宗時有接觸。特別是鍾肇政，他和龍瑛宗同為客家人，常找龍瑛宗。1976年10月以後，鍾肇政接編《台灣文藝》，1978年7月又接任《民眾日報》副刊主編。龍瑛宗不滿足於只讓舊作重新問世，而又拿起筆來持續寫小說，應和鍾肇政的鼓勵和為他尋找發表園地有關。

不過，龍瑛宗本人顯然也有重出江湖的願望，事實上，自1976年8月退休以後，他已閉門在寫小說。據許維育根據龍瑛宗手稿及自訂年表排比，從1976年到1979年，他的新作包括《媽祖宮的姑娘們》（中篇）、《夜流》、《月黑風高》、《紅塵》（長篇）等。<sup>⑩</sup>這些作品都是用日文創作的。到1979年5月，《夜流》才發表於日本雜誌，6月21日之後，鍾肇政中譯的《紅塵》才開始在《民眾日報》連載。因此，可以說，龍瑛宗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創作長達三年。這可以看出，他再出發的強烈心願。

龍瑛宗復出文壇的奇異之處在於，寫出四篇日文小說之後，他決心要開始用中文寫作了。修訂完《紅塵》不久，他就在一篇用中文寫的雜文上說：

我到了人生的暮年，仍未親身以國文寫小說，察覺很遺憾的事，假如健康許可的話，我想寫短篇小說。但願有生之年，以國文來創作，這才有面子去看祖先們。<sup>21</sup>

這裡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才有面子去看祖先們”這一句話。如果刻意深求的話，也許在這時他已有了“如果可能，要到大陸看看”的想法（此點詳後）。根據他的自述，他於1979年以中文寫出《斷雲》，1980年寫出《杜甫在長安》。對於他這一次的經歷，他還有兩次回顧：

我便告訴坐在旁邊的王詩琅兄：我想寫杜甫的故事，您老兄也寫小說吧！……我已經下定決心，趁此機會，不管寫得是好是壞，一定以中文來創作。<sup>22</sup>

我曾向王詩琅兄說：“我們從事創作吧！”終於得到一篇《沙基路上的永別》的名作。那年，我開始由日文寫中文。<sup>23</sup>

就在他努力與中文搏鬥的時期，張良澤剛編完《鍾理和全集》，為了系統的整理、翻譯龍瑛宗的著作，找上了門。對這一件事，龍瑛宗如此回憶：

張良澤氏整理了鍾理和作品後，有一次，偕同鄭清文、趙天儀兩氏來我家。邀我把日文稿子整理後交付他。我雖然感謝他們的厚意，還是拒絕了。這是由於我的學習中文，遲遲難於進步之故。如果學習無望，則寧願從此封筆，甚至廢棄做一名作家。<sup>24</sup>

“寧願從此封筆”，這麼強的決心，真是要令人訝異。我個人曾經聽鄭清文先生談起一件事：龍瑛宗的中文作品有一次被《聯合報》副刊退稿，他很生氣，鄭先生勸他，既然如此，何不用日文創作，再由他們翻譯，龍瑛宗非常不以為然。這些都可以看出，龍瑛宗非常在意自己不能成為一個中文小說家。

龍瑛宗的中文創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長安》。雖然在這之前，他已用中文寫了《斷雲》，但他一直把《杜甫在長安》列為他的第一篇中文小說。據許維育所說，龍瑛宗日據時代透過日文讀杜甫，並由此認識唐代。他寫過一首日文詩《杜甫的夜》，其中有句云：

我是  
悲哀的浪漫主義者  
現在  
靜靜地與您相對<sup>25</sup>

可見他對杜甫的認同感，他把兩個兒子都命名為“甫”（文甫、知甫），也是這種心意的表現。<sup>26</sup>而他堅持要成為中文小說家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杜甫在長安》。對於他這篇小說所要表白的心意，他毫不諱言的說：

自從祖先來台灣，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了。祖父、父親和我三代，未曾踩著大陸的故土去掃墓。偶爾幻想著大陸河山，而老邁與日俱增。望鄉之情，令我寫了短篇《杜甫在長安》。<sup>27</sup>

據別人轉述，他還說過這樣的話：

我出生時，台灣已割讓給日本，我從小受日本教育，長大後愛看的文學作品，也都是日文的，但是我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心中一直希望能為中國文化做點事，現在我努力用中文寫成《杜甫在長安》，想透過作品告訴讀者，中國在一千多年前已有世界最高度發展的文化。<sup>28</sup>

這段話最值得玩味的是：“想透過作品告訴讀者，中國在一千多年前已有世界最高度發展

的文化”。如果對照八十年代以後，台獨言論逐漸出現，棄絕中國、藐視中國的言談時時見之於文，那就更能了解龍瑛宗說這些話的用心與勇氣。因此，連頗受台獨思想迷惑的許維育都很肯定而明白地說：

龍瑛宗將《杜甫在長安》與他自己對中國的孺慕之情加以連結；當龍瑛宗決定要以中文創作小說時，由中文牽引出的中國影像便浮現出來，而龍瑛宗腦海中最為嚮往的中國影像，則是古中國的唐朝盛世，以及那個時代中的杜甫。<sup>②</sup>

這是對《杜甫在長安》的寫作用心所作的非常正確的評斷。

龍瑛宗一生最令人驚訝、也最為令人佩服的一件事是：在1987年11月開放大陸探親以後，他雖然已達高齡（77歲），而且，攝護腺開過刀，引發十二指腸潰瘍，大病一場，身體虛弱，無法久站，<sup>③</sup>而仍立即於次年赴大陸旅遊。他以前是“偶爾幻想著大陸河山”（見前引），現在則非親眼看看不可。他一共去了三次，包括1988年的北京、南京、上海、桂林等之旅，1990年初夏的新疆、西安等絲綢路之旅，1991年成都特訪杜甫草堂及長江三峽、黃山之旅。一九九〇年他遊西安時，是由陪同旅遊的劉知甫把他背上大雁塔的。<sup>④</sup>據劉知甫所述，龍瑛宗“遊西安大雁塔時，剛到塔底便佇立許久，其他觀光客都已經上塔又下來了，他還站在塔底仰首凝望。”<sup>⑤</sup>

看到79歲（傳統算法是80）的龍瑛宗的這種形象，真是令人既感慨、又感動。

龍瑛宗在自傳性小說《暗流》裡，這樣寫著：

杜南遠在天天夜裡看見了幻覺。那是叫人藐視的支那人的面貌，留著辮子的枯瘦長臉的人。蒼白顏色誠然為了生活憔悴極了的面容，在一片黑暗裡坐著朱紅板圓凳椅子，蒼白臉龐盯著杜南遠一動也不動，一到了夜晚，總是出現了那個面貌，帶稍憂愁的臉龐，好像要訴說什麼傷心事，但好像又不是。<sup>⑥</sup>

這樣的“支那人”的形象是龍瑛宗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屈辱地背負起來的。他堅忍而畏縮的一生就是一直活在這陰影底下。在《月黑風高》這篇小說中，他寫道：

究竟我是中國鬼，抑是日本鬼？如果，讓我自由選擇的話，我寧願不做大日本帝國的三等國民，而甘心做個中國鬼。那個中國人到底怎麼樣的人種呢？你們還記得嗎？有一段時期，中國人被帝國主義者，看作狗類而不是人類。你們不會忘掉吧。咱們的神聖領土上，公園入口處立著告示牌：支那人及狗不准進來。一段時期的日本人，指漢民族是支那人，而不肯承認中國人的過去，有輝煌文化歷史。所以，我再說一次，我不願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甘願做自己歷史的主人翁。<sup>⑦</sup>

他要做“自己歷史的主人翁”，所以，即使是八十歲了，他仍要登上大雁塔，眺望祖國的山河。在《杜甫在長安》中，他曾經藉著登上大雁塔的杜甫之眼，在幻想中望過一次，現在他真正的望到了。以這樣的背景來閱讀《杜甫在長安》，雖然意識到龍瑛宗的中文不順暢，仍然會被其中貫注的熱情所感動。

### 三

龍瑛宗的後半生是令人驚嘆的。在日據時代，他因《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而成名後，因其文學風格與西川滿相近，而被西川滿所賞識，成為西川滿周圍最重要的小說家，並因此而引起與西川滿對抗的張文環、呂赫若等台灣作家的疑慮，以為他喪失立場，後來才發現是誤會。<sup>⑧</sup>八〇年代，龍瑛宗的舊作被翻譯出版以後，一般論者也只注他作品中的感傷、頹廢色彩，因此沒有得到



應有的重視，論者寥寥。這些都妨礙了人們真正去理解龍瑛宗。

戰後龍瑛宗的第一個引人注意之處是，他在光復初期，因復歸於本民族而產生興奮之情，一直努力要擺脫以前那種小知識分子的感傷氣息，企圖向民眾文學靠攏。他迅速地認識到，台灣必須和全中國同其命運，並殷切盼望中止內戰。他的行動能力遠比不上呂赫若和楊逵，但他對大局的了解跟他們不分上下。這一切都證明，日據時代那種感傷文學主要是時代使然。在殖民統治下，他心靈所受的創傷不下於當時任何反抗型的作家。

其次，在國民黨高壓統治時代，他完全不被反共宣傳所惑。為了不被利用，他選擇停筆，同時，還留心大陸的發展。這證明，雖然在兩岸隔絕的狀態下，他仍然從全民族的立場來思考、來觀察。

因此，在時勢（七〇年代以後）改變之後，他積極投入，決定再出發，“希望能為中國文化做點事”（見前引）。他不辭辛苦以68歲高齡學習中文寫作，並無視於當時與他親近的友人鍾肇政、張良澤及其他台籍文化人越來越明顯的台獨傾向，明白表示他對中國的認同。

最後，當兩岸可以來往，他以最快的速度到大陸旅遊，而且一去三次，跑的地方都是中國著名的古都、名勝。他的大陸之行可以說是他臨終之前精神上的“落葉歸根”之旅。從心靈上來說，這是他長期被殖民統治屈辱、挫傷、被國民黨高壓統治阻礙、推遲，歷盡種種挫折，最後的民族感情的宣洩。我相信，他對自己一生的結局一定相當滿意。

2002年，葉石濤被邀請到日本演講，接受山口守訪問時說，“若要從台灣的主體性來思考時，楊逵先生根本是不合格的，那個人根本是大中國主義者，龍瑛宗也是不合格。”還說，這會影響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sup>⑤</sup>這樣的批評其實正是對龍瑛宗的“表揚”，同時也阻斷了台獨派學者以己意“詮釋”龍瑛宗的道路。其實，龍瑛宗的立場，在本文所舉的一些引文中已經說得夠明白了，只是台獨派不願意正視而已。從台灣歷史所走的艱難道路而言，龍瑛宗的一生過得極艱苦、極隱忍，但從未喪失對本民族的熱愛和信心。他和許許多多的反抗型作家一樣，都值得我們欽佩和尊敬。

（我的博士生黃琪椿協助覆核引文，謹此致謝）

①本人已有《龍瑛宗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形象》一文，論述其戰前作品，見《殖民地的傷痕》，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②葉石濤：《府城瑣憶》，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41～42頁。

③原為日文，此處所引為龍瑛宗自己的中譯，見《杜甫在長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第124～125頁。

④原文為日文，龍瑛宗中譯亦見《杜甫在長安》。但龍瑛宗在中譯時將此段縮短（應該是基於藝術上的考慮），此處所引為曾健民譯文，見趙遐秋、呂正惠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第157～158頁。

⑤曾健民譯文，見趙遐秋、呂正惠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第165頁。

⑥轉引自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32頁（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中華日報》文藝欄以中日對照的方式印行，此處所引為其中的中文。又，《卷頭語》並未署名，但許維育、王惠珍、黃琪椿均認為日文版本應是龍瑛宗所作，中文版本可能是別人代譯。此一《卷頭語》並未收入《龍瑛宗全集》。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林至潔譯，見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六冊《詩·劇本·隨筆集》（1），台北：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第262、84～85、264、86、87、329頁。

- ⑧陳千武譯，見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五冊《評論集》，第210～211頁。
- ⑨林至潔譯，見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八冊《文獻集》，第18～19頁。
- ⑩許維育懷疑，這可能是《中華日報》的決策在主導，見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37頁。
- ⑪原文為中文，見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六冊《詩·劇本·隨筆集》（1），第271頁。
- ⑫關於龍瑛宗在合庫的經歷，參見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60～61頁。
- ⑬⑭⑮⑯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62、65頁；第66頁；第75頁；第118～119頁。
- ⑰龍瑛宗的次子劉知甫跟我說，龍瑛宗存有許多剪報（現存放台灣文學館），這些剪報很多是大陸消息，特別是有關軍事力量（包括試爆原子彈）的消息。我曾把這一件事告訴日據時代另一文化人葉榮鍾的女兒葉芸芸，葉芸芸也說，他父親也是這樣做的。由此可見，他們兩人（也許還有一些老文化人）一直在關心大陸的發展。
- ⑱⑲⑳㉑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詩·劇本·隨筆集》（2），第33、110、33頁。
- ㉒《午前的懸崖》，“自序”，台北：蘭亭書屋，1985年，第7～8頁。
- ㉓林至潔譯文，見台北：《聯合文學》，12卷12期，1996年10月。龍瑛宗的自譯如下：“我是悲哀的浪

漫主義者／在此／靜靜地相對著”，台北：《自立晚報》，1979年3月20日。

㉔龍瑛宗與杜甫的關係，參看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119頁。文中記述，劉知甫說，他父親到蘇州時，想起杜甫的姑姑住在蘇州，可見龍瑛宗對杜甫的一切極為熟悉。

㉕陳白：《山河之愛》，見聯合報編輯部：《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合報，1981年，第62頁。

㉖龍瑛宗晚年身體狀況，見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137～138頁。

㉗本人多年前與劉知甫通電話時，聽劉先生所說。

㉘劉知甫對許維育所說，見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第119頁。

㉙㉚《杜甫在長安》，第29、128頁。

㉛參見羅成純：《龍瑛宗研究》，《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第256～258頁、236頁。

㉜見《葉石濤全集》，第12冊，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文化局聯合出版，2008年，第442頁。

**作者簡介：**呂正惠，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教授。

**[責任編輯 陳志雄]**